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文库
中意文化交流史

主编 张西平 [意] 马西尼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ACQUAINTANCE

著者 张西平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西文化的初识
北京与罗马

中西文化的初识
北京与罗马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ACQUAINTANCE

著者 张西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西文化的初识:北京与罗马/张西平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7

(国际文化交流文库. 中意文化交流)

ISBN 978-7-5617-8798-4

I. ①中… II. ①张…②马… III. ①文化交流—文化史—北京市、罗马—明清时代 IV. ①K291②K546.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7010 号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文库 中意文化交流史 中西文化的初识:北京与罗马

著 者 张西平
责任编辑 储德天
审读编辑 孙 浩
责任校对 林文君
装帧设计 魏宇刚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华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9.75
字 数 307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8798-4/G·5216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文库”编委名单

主编:张西平、李雪涛

编委成员:(按姓名首字的汉语拼音为序)

[泰]巴萍(Prapin Manomaivibool)、[韩]崔溶彻、[英]傅熊(Bernhard Fühner)、耿立群、[德]顾彬(Wolfgang Kubin)、[中国台湾]顾敏、耿相新、耿昇、何培忠、侯且岸、李明滨、李雪涛、[新]李焯然、[美]柯文(Paul A. Cohen)、孟华、[俄]米亚尼斯科夫(V. S. Mjasnikov)、[意]马西尼(Federico Masini)、[印]莫汉迪(Manoranjan mohanty)、[美]裴宜理(Elizabeth Perry)、任大援、[德]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ntzer)、[印]谭中(Tan Chung)、[中国香港]王向华、王晓平、[英]吴芳思(Frances Wood)、[中国澳门]吴志良、[日]兴善宏(Kozen Hiroshi)、杨慧林、阎纯德、严绍璁、詹福瑞、张西平、张晓慧、朱杰人、朱政惠

总 序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唯一流传至今，仍生机勃勃的文明。中华文明不仅始终有着独立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系统，而且长期以来其高层次的发展影响周边的文化。从秦至清两千年间，中国始终是亚洲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中华文明强烈地影响着东亚国家。在 19 世纪以前，以中国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包括日本、朝鲜、越南在内的中华文化圈，与基督教文化圈、东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和印度文化圈并称为世界五大文化圈。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历经磨难，即便此时，中国知识分子对其的祈盼从未停顿。“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①梁启超这激越的文字给处在转折中的中国人多少理想。从 16 世纪以来，中国已经不可能在自己固有的文化发展的逻辑中演化前进。作为后发现代化的中国，在西方外来势力的干扰下，它自身发展的逻辑被打断，在百年的磨难中，中国人民顽强的奋进和努力的探索，对西方文化做了自己的创造性的改造和吸收。“中国近现代新文化既非单纯的西学东渐，也非中华传统文化全方位的直接延续，而是西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杂交、相化合的产物。”^②

当代中国的发展有着自己的逻辑，它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非空中楼阁，

①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②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编：《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 卷，第 924 页。

中华文化是其伟大成就的思想支撑。中国的古代、近代和现代文化并未断裂,中国古代文化并未死亡,它以新的形态存活在当代文化中。从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怎样融汇和吸收西方文化,完成自己的社会角色转变。中国有着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它不需要,也不可能完全按照西方的道路实现自己的现代化。学习西方乃至世界各种先进和优秀的文化为我所用,在自己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文化,近四百年的中国文化大体是沿着这样的逻辑发展演变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博物馆的文化,一个只是发古人之幽思的死去的文化,它活着,发展着。中国文化在晚明以来的四百年历史中有着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和主题:学习西方、走自己的路,这样的自觉性使中国文化获得新生。如鲁迅所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古代三千年,近代一百年,建国六十年,环环相扣,代代相传,万变不离其宗,中国文化,历经磨难,凤凰涅槃。

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自觉是中国文化百年变更的一个最重要成果,中华民族在1949年获得国家的独立和民族文化的再生有着历史和文化上的内在逻辑。美国著名中国学家费正清告诫西方人“要了解中国,不能仅仅靠移植西方的名词,它是一个不同的生命。它的政治只能从其内部进行演变性的了解”,他又说:“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的当代的形式,是一个基本上独立的进化过程的最终产品,它可以与希腊—罗马的犹太—基督教的西方相比,但绝不是一样的。”^①按照费正清的理解,文化民族主义,在西方帝国主义压迫下的国家独立与民族存亡的思想,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国当代历史发展的逻辑基础。

今天发展的中国以更大的包容性吸收着各种外来文化,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伟大历史转折中,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底色,为现代文化的创新提供了智慧和思想,近现代文化的变迁和发展成为我们今天创造新文化的出发点。正像经过六百年的消化和吸收,中国彻底完成了对佛教的吸收一样。四百年来自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与改造为今天中华文化的重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以其特有的古代文化的资源和现代文化再生的历程可以给当代世界展示其文化的独

^① (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革命的中国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5页。

特魅力,可以为今天的世界提供一种古代与现代融为一体的智慧与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经过近代和当代的洗礼,以新的形态存活在中国人的心中,经过近现代西方文化洗礼后的中华文化仍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在探索中行进的中国人并未迷路,在困顿中创新的中国人并未停止探索。分歧和争论时时发生,矛盾与苦恼处处困扰着我们,但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更为成熟的新的文化形态形成的标志;思想从未像今天这样活跃,社会生活从未像今天这样复杂与丰富,历史的转型从未像今天这样急速,但我们知道,我们在开创着历史,这一切都是一个更伟大的新文化诞生的开始。在向世界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的文化观念开始开阔,在消化外来文化之时,我们开始自觉。在发展中我们获得新生,在伟大的历史成就面前我们有理由为我们的文化感到自豪。中国近三十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完全可以和人类史上任何一段最辉煌的历史相比,我们有理由将自己积淀三千年,历经百年磨难后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所迸发出来的思想和智慧介绍给世界,与各国人民分享中国的智慧。

这构成了“国际中国文化研究文库”的基本文化立场。

二

梁启超在谈到中国历史的研究时曾说过,根据中国的历史的发展,研究中国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以及“世界的中国”三个阶段。所谓“中国的中国”是指中国的先秦史,自黄帝时代直至秦统一,这是“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所谓“亚洲之中国”,是为中世史,时间是从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末年,这是中华民族与亚洲各民族相互交流并不断融合的时代;所谓“世界之中国”是为近世史,自乾隆末年至当下,这是中华民族与亚洲各民族开始和西方民族交流并产生激烈竞争之时代。由此开始,中国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梁公这样的历时性划分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是一直存在的,尽管中国的地缘有一定的封闭性,但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封闭的文化,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也不是从乾隆年间才开始。中国文化在东亚的传播,如果以汉籍传入为起点已经有一千多年^①,中国和欧洲的

^① 参阅严绍璁:《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关系也可追溯到久远年代,在汉书中已经有了“大秦国”的记载^①,而早在希腊拉丁作家的著作中也开始有了中国的记载,虽然在地理和名称上都尚不准确。^②我曾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划分为“游记汉学阶段”、“传教士汉学阶段”和“专业汉学阶段”三个阶段,^③虽然这样的划分有待细化,但大体说明欧洲人对中国认识的历史进程。这说明中国文化从来就不是一个完全封闭性的文化,它是在与外部世界文化的交流与会通中发展起来。因此,在世界范围展开中国文化的研究,这是中国文化的历史本质所要求的。唯有此,才能真正揭示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文库”的主旨就是探索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的传播与影响,对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中国文化研究给予学术的观照。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背景下追踪中国文化典籍外传的历史与轨迹,梳理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的历史、人物和各种译本,研究各国汉学(中国学)发展与变迁的历史,并通过对各国重要的汉学家、汉学名著的翻译和研究,勾勒出世界主要国家汉学(中国学)的发展史。

严绍璦先生在谈到近三十年来的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意义时说:“对中国学术界来说,国际中国学(汉学)正在成为一门引人注目的学术。它意味着我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认识愈来愈深入,也意味着我国学术界愈来愈多的人士开始认识到,中国文化作为世界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对它的研究,事实上具有世界性。或许可以说,这是二十年来我国人文科学的学术观念的最重要的转变与最重大的提升的标志。”^④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人文学术的研究,诸如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考古等等,严先生所说的对其的研究是“我国人文科学的学术观念的最重要的转变与最重大的提升”,就是说对中国人文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中国本土,而应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当年梁启超立论他

① 参阅(德)夏德著,朱杰勤译:《大秦国全录》,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美)费雷德里克·J·蹄加特著,丘进译:《罗马与中国》,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英)H·裕尔著,张绪山译:《东域记程录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 (法)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③ 张西平:《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中华书局2009年版。

④ 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5期,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的中国历史研究时就有两个目的：其一，对西方主导的世界史不满意，因为在西方主导的世界史中中国对人类史的贡献是看不到的。1901年，他在《中国史叙论》中说：“今世之著世界史者，必以泰西各国为中心点，虽日本、俄罗斯之史家（凡著世界史者，日本、俄罗斯皆摈不录）亦无异议焉。盖以过去、现在之间，能推衍文明之力以左右世界者，实惟泰西民族，而他族莫能与争也。”这里他对“西方中心论”的不满已经十分清楚。其二，从世界史的角度重新看待中国文化的地位和贡献。他指出中国史主要应“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其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人类所应负之责任”^①。虽然当时中国积贫积弱，但他认为：“中国文明力未必不可以左右世界，即中国史在世界史中当占一强有力之位置也。”^②只有对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中国文化研究给予观照，打通中外，从世界的观点来看中国才能揭示中国文化的普世性价值和意义。

三

对世界各国的中国文化的研究应从知识论和方法论两个角度加以把握。

从知识论上来说，各国的汉学家在许多具体学科的研究上颇有建树，我们只要提一下以伯希和所代表的欧洲汉学家对西域和敦煌的研究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推进中国文化研究的价值，这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因此，对域外汉学家所做的中国文化研究的成果，万不可采取一种轻视的态度。中国文化已经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因此，在许多中国文化研究的具体门类和学科上，在知识论的研究方面最好的学者并不一定在中国大陆，他们可能是日本人、法国人、德国人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域外汉学并非像赛义德所说的完全是一种“集体的想象”，也并非是在本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完全影响下，一种没有任何客观性的知识。就西方汉学（中国学）而言，赛义德在其《东方学》中的一些观点值得商讨：“东方主义的所有一切都与东方无关，这种观念直接受惠于西方的各种的表现技巧……”。由此，西方的整个东方学在知识论上都是意识形态化的，其真实性受到怀疑。他认为西方的东方学所提供的是“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和帝国主义的定性概念”，因而，他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3，第7页。

②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6，第2页。

认为,东方学的失败既是学术的失败,也是人类的失败。赛义德的观点显然不符合西方汉学的实际情况,作为西方知识体系一部分的东方学,它在知识的内容上肯定是推动了人类对东方的认识的,从汉学来看,这是个常识。因此,系统地梳理各国的中国文化研究历史,如上面所讲的展开对域外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流派、人物的研究是本文库的基本学术追求。

但域外的中国文化研究毕竟发生在域外,对其的把握仅仅从知识论的角度加以认识仍显不够,我们应注意把握这些发生在海外的中国文化研究所采取的方法论,注意从跨文化的角度,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加以把握和理解。从西方汉学(中国学)来看,它是西方学术体系中的一个分支“东方学”的一部分。既然它是西学的一部分,它必然要遵循西方学术的传统和规范。这样汉学和国学之间既有同,也有异。同:表现在内容上,无论是传统的汉学还是当代的中国学,材料、文献都是中国的;异:则表现在学术规范和方法上,最终还在问题意识上,它是从自身的文化发展的需要出发的,从一个“他者”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这样,在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中就必须从一种跨文化的角度,运用比较文化的方法来分析汉学。一些国内做“国学”研究的学者认识不到这一点,往往将“汉学(中国学)”和他们自己所从事的“国学”相等同,对其“同”的部分比较赞赏,认为有水平,对其“异”的部分不太欣赏,对汉学家们对中国文化和学术的“误读”尚不能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究其原因,就是缺乏一种比较文化的视角,不能运用跨文化的研究方法来对待这些发生在中国以外的中国文化研究。

笔者认为,在把握这些发生在京都、巴黎、哈佛的中国学时,以下两点是很重要的:首先,母体文化对汉学(中国学)家学术视野和方法论的影响。平心而论,赛义德说,西方的东方学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海外扩张而形成的,这说的是对的,东方学受到其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也是对的。但由此认为西方的东方学“并没有我们经常设想的那么具有客观性”的结论缺乏具体分析。赛义德所提供给我们的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评价西方的东方学的方法是有价值的,用比较文化的方法来分析汉学(中国学),就是要考察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的汉学(中国学)家是如何在跨文化的语境中展开这种学术研究的,分析他们的在具体的文献和材料背后的一般性的方法,这是我们在观照域外的中国文化研究时一个基本的立足点。由此,我们就会看到汉学家区别于中国本土的“国学”研究者的主要地方在于学术视野和方法论。例如,法国

汉学家马伯乐对中国上古文化和宗教的研究受到涂尔干社会学的影响,从而开创了我国宗教社会学研究之先河,对他这种宗教社会学方法论的吸取推动中国本土的社会学研究。当年杨堃先生受教于马伯乐,成为我国社会学研究中最先采用宗教社会学方法的学者,而我国的宗教学界几乎没有人知道早在近一百年前马伯乐已经创立了这种方法。这两年国内宗教学界才开始注意到宗教社会学,但他们只不过是西方的宗教社会学搬来而已,仍不知我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真正创始人是法国汉学家马伯乐。社会学和宗教学在对待马伯乐汉学研究中的方法论的两种态度,对这两个学科的发展都产生了影响。夏志清运用新批评主义的形式主义分析方法,重评中国现代文学史,使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又回到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视野之中,这种方法极大启示了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注意其方法论注意其新的学术视角运用比较文化的研究方法揭示出隐藏在其“客观知识”背后的方法论,这正是我们展开国际中国文化研究者的基本任务。

其次,注意“影响史”的研究。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和影响是两个相互关联而又有所区别的领域,一般而论,传播史则重于汉学(中国学),即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域外的中国形象首先是通过他们的研究和介绍才初步建立的;影响史或者说接受史则已经突破学术的侧面,因为国外的中国文化研究在许多国家仍是一个很偏僻的学科,它基本处在主流学术之外,或者处于学术的边缘。中国文化在域外的影响和接受主要表现在主流的思想界和文化界,但二者也很难截然分开,因为一旦中国文化的典籍被翻译成不同语言的文本,所在国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就可以阅读,就可以研究,他们不一定是汉学家,但同样可以做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他们对中国的兴趣可能不低于汉学家,特别是在创造自己的理论时。英国 17 世纪的学者约翰·韦伯从来没见过中国,但他所写的《论中华帝国之语言可能即为原始语言之历史论文》的书是西方第一本关于研究中国语言的专著,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你很难说它是汉学著作或者不是,但其影响绝不低于任何一本汉学的专著。美国的思想家爱默生、诗人庞德,欧洲的哲学家荣格等都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例子很多。因此,接受史和影响史也应成为我们从事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这方面前辈学者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范式”,钱钟书在英国时所写下的《16 世纪—17 世纪英国文学对中国文化的接受》、范存忠的《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陈受颐的《中国文化对 18 世纪

英国文化的影响》、朱谦之的名著《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法国学者毕诺的《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都是我们在做中国文化的影响史研究时所必读的书。“东方代表着非我,相对这非我,西方才得以确定自己之为自己,所以东方乃是西方理解自己的过程中在概念上必有的给定因素”(张隆溪)。从18世纪的中国热,伏尔泰认为中国是“天下最合理的帝国”到19世纪中国完全失去了魅力,黑格尔认为中国是一个只有空间没有时间的国家,一个停滞的帝国。在西方文化史上中国一直是作为西方确立自我的“他者”而不断变换着。在这个意义上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是我们对国际中国文化展开研究时的天然盟友。

对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的传播与影响,既要从知识论的角度展开各国汉学史的学术史追踪,也要从跨文化和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思想、艺术等领域中的影响,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国际中国文化研究文库”的基本内容。

四

这种发生在域外的关于中国的学问和我们本土的学术有什么关系呢?它对中国本土学术的发展有什么价值和影响呢?

其实,海外汉学(中国学)从其诞生起就同中国学术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特别是西方汉学,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近现代学术的产生是和西方近现代的汉学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中国近现代学术之建立是中国本土学者与汉学家们互动的结果。利玛窦与徐光启,理雅格与王韬,王韬与儒莲,伯希和与罗振玉,胡适与夏德、钢和泰,高本汉与赵元任等等……,汉学家与中国学人的交往,我们还可举出许多例子,正是在这种交往中双方的学术都发生了变化,互为影响,相互推动。戴密微在厦门大学任教,卫礼贤执教于北大讲坛,陈寅恪受聘于牛津、剑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双方的交往比今天还要频繁。就中国来说,正是在这种交往中,中国学术逐步地向现代化形态发展。

当年傅斯年在谈到伯希和的学问时说:“本来中国学在中国在西洋原有的不同的凭借,自当有不同的趋势。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比较材料而隔膜。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而纯粹的汉学题目,或不易捉住。今伯先生能沟通此风气,而充分利用中国学人成就,吾人又安可不仿此典型,

以扩充吾人之范围乎。”这说明了当时汉学对中国学人的启示。实际上近现代以来,中国学术对西域的研究日益加强,引起许多学者感兴趣,这显然是受到了西方汉学家的影响。胡适在1916年4月5日的日记中说:“西人之治汉学者,名 Sinologists or Sinoloques,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然其人多不为吾国古代成见陋说所拘束,故其所著书往往有启发吾人思想之处,不可一笔抹煞也。”这里胡适已认识到汉学的特点,以后胡适在与汉学家钢和泰交往中改变了原来认为汉学家治学“成效殊微”的看法,而是直接向钢氏求教梵文。而他对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评价更说明西方近代汉学对中国学术的影响,高本汉以治音韵学而著称,胡适说:“近年一位瑞典学者珂罗倔伦(即高本汉)费了几年工夫研究《切韵》,把260部的古音弄得(原文如此)清清楚楚。林语堂先生说:‘珂先生是《切韵》专家,对中国音韵学的贡献发明,比中外过去的任何音韵学家还重要。’”(《语丝》第四卷第27期)珂先生成绩何以能这样大呢?他有西洋音韵学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地运用方言的材料,用广东方言作底子,用日本的汉音吴音作参证,所以他几年的成绩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三百年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功夫。”鉴于西方汉学的这一成就,他号召青年人要掌握新的研究方法,那时再来重新整理国故,便可“一拳打倒顾亭林,两脚踢翻钱竹江”。当时西方汉学对中国学界的冲击非常之大,以致陈垣先生说:“现在中外学者谈论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到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其实中国近代学术从传统的经学研究方法转变为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一个重要因素是受启于海外汉学。陈寅恪任教清华之初,遵循地道的欧洲汉学及东方学方法,讲授欧洲东方学研究之目录学。赵元任和李方桂的语言学研究走出传统的小学,而采取现代语言学的方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高本汉语言学研究的影响。这说明汉学和我们自己本土的学术传统有着内在的联系。

中国本土的学者“今天必须面对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从日本、欧洲到北美,每一天都有关于中国古今各方面的研究成果问世。如果我们继续把这些成果都称之为‘汉学’,那么‘汉学’与中国本土的‘国学’已经连成一体,再也分不开了”(余英时)。对中国本土学者来说“要求每个学者对本专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进展了如指掌,有点不切实际,但将海外中国学家的贡献纳入视野,对于生活在中国的新一代学者来说,不但可能,而且必须”(陈平原)。实际上汉学(中国学)的引入具有双向的意义,它不仅使学术转型中的中国本土学术

界有了一个参考系,并为我们从旧的学术“范式”中走出,达到一种新的学术创新提供了一个思路,同时也对国外的中国文化研究者们,对那些在京都、巴黎、哈佛的汉学家(中国学家)们提出了挑战,正像中国的学者必须面对海外汉学(中国学)家的研究一样,他们也应该开始听听中国同行的意见。我们在《国际汉学》的第7期曾发表包卫民先生批评内藤湖南“宋代革命论”的论文,王志平先生批评《剑桥中国史》中的关于中国语言学史的观点。我们想通过正常的批评,纠正那种仿佛只要洋人讲的就没错的“殖民地思想”,把对汉学(中国学)的引进和批评统一起来,在一种平等的对话中商讨和研究,这才是一种正确的学术态度。对国外中国文化研究成果也不可盲从,正像对待所有的学术成果都不应盲从一样。实际上在西方不仅那些把中国作为“他者”的思想家,文学家在讲中国时常常满口错话,就是在大汉学家那里,常识性的错误也不断出现。周锡瑞先生一字一句的指出美国当代中国学家何伟亚(James L. Hevia)在其成名作《怀柔远人:马戛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中词表里的错误,他在著名的《剑桥中国史》中也有很低级的错误。这样讲时并不是否认这些汉学家在学术上的贡献,而是现在海外的汉学家们必须考虑到他们的著作如何面对中国读者,因为一旦他们的书被翻译成中文,他们的书就会成为中国本土学者的阅读、审视和批评的对象。对于那些做中国的学问而有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上的汉学家来说,现在是到了他们开始反思自己学术立场的时候了。而那种居高临下,对中国大陆的学术指东道西,以教师爷身份出现的汉学家则可以收场了。

当我们面对大量涌进的海外汉学研究的成果,一方面,我们应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一种多元的学术态度,不能有那种“画地为牢,反正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对汉学家研究的成果视而不见的态度。同时,也应考虑到这是在另一种学术传统中的“学问”,其特有的文化和学术背景,不能拿来就用,要做比较文化的批判性研究。随着汉学(中国学)的不断引入,对汉学著作做一种批判性研究和介绍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在不同学术传统中的概念和方法的转化和使用必须经过严格的学术批判和反思才行。在这个意义上运用比较文化的视角和方法尤为重要。如何立足中国本土的学问,在借鉴汉学的域外成果上,从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创造出新的理论,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追求所在。

中国是汉学的故乡,对中国文化的学术研究中国学者自然有着国外学者

不可替代的优势,在世界范围展开中国文化的研究开阔了我们的学术和文化视野,促进了我们观念和学术的发展,引进域外中国文化研究的成果是为了我们自身学术和文化的变革与发展,万不可在介绍西方汉学(中国学)走马灯似的各类新理论、新方法时,我们自己看花了眼,真成了西方的东方主义的一个陪衬,失去了自己的话语和反思的能力。

立足中国文化的立场,会通中外、打通古今,通过对域外的中国文化研究做建设性的学术对话,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和文化的重建,这不仅成为本文库的主要内容,也成为我们展开这一学术活动的根本目的。

五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在对域外中国文化研究的称谓上仍无法完全统一,“汉学”或“中国学”都有其自身的逻辑和思路,任继愈先生在他为在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国际汉学书系”所写的总序中说:“我们不准备用很多精力界定这个名词,我们只是把过去和现代人们已经发表的和正在从事研究的这一类译著汇集起来。总之,都属于中国文化这个大范围之内的著作。”今天,我们仍然采取这样的学术立场,为兼顾各方的学术立场,本丛书定名为“国际中国文化研究文库”,在实际的研究和出版中我们将海纳百川,欢迎海内外的中国文化研究者为我们撰稿,或译、或著我们都衷心地欢迎。同时,我们将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网站上开设本文库的专栏,欢迎各方学者对我们的译著、著作和期刊批评帮助。学术乃天下公器,学术在批评中发展和繁荣。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自 1996 年成立以来,致力于海外汉学的研究,在十余年的历程中我们在季羨林、任继愈先生和李学勤、汤一介等学术前辈的关怀下,我们与国内外的同行们一起做了些基础性的工作。现在与华东师大出版社携手,在原有的大象出版社的“国际汉学书系”的基础上另开辟“国际中国文化研究文库”,在中国文化开始大规模的走向世界的今天,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的今天,我们希望通过这两套书系,为这个伟大的时代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张西平

2010 年 3 月 28 日 于北京

序言 中国和意大利——两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交往

在中国人眼中，意大利是一个神奇的国家。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米开朗基罗的《大卫》、薄伽丘的《十日谈》，这些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们的作品，读书人几乎人人皆知。“意大利是欧洲近代文化的长子”，它这一特殊的历史地位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它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

而威尼斯的水乡、比萨的斜塔、罗马的古斗兽场、庞贝的废墟，这一切在圣彼得大教堂悠远钟声中都被笼罩上了一种神秘的光环。“意大利是上帝选中的国家”，“罗马是全球天主教徒的圣地”，这些使许多中国人对意大利有一种崇敬感。

但对中国来说，意大利还有着另一层特殊的意义，即它是我们最早结识的欧洲国家。中国古代史书所说的“大秦”、“拂菻”，汉代甘英西使时在“条支”隔海相望的陆地，唐代东来的景教徒的故乡，指的都是一个国家：罗马帝国。在《后汉书》中有对罗马最早的记载：

大秦國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爲城郭。列置郵亭，皆坐墜之。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皆髡頭而衣文繡，乘輜輶白蓋小車，出入击鼓。建旌旗幡帟。

所居城邑，周圍百餘里。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爲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宮，聽事五日而後徧。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

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①

这里的大秦究竟讲的是哪里呢？一些学者认为讲的就是今天的罗马。

对罗马人来说，中国则是遥远的东方。中国和罗马帝国虽远隔千山万水，但在罗马帝国东征和汉朝经营西域的过程中两个伟大的文明或直接或间接地发生了联系，这些历史学家已经有深入的研究。

这样，在罗马人的历史文献中就有了对遥远的中国的进一步的认识，在幻想中踏出了迈向实际知识的第一步。

首先，罗马人对中国的地理位置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生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人科斯马斯（Cosmas Indicopleutès）在他的《世界基督风土志》（Universal Christian Topography）一书中讲到中国时说：“我可以提一下，产丝之国位于印度诸邦中最遥远的地方……。这个国家叫秦尼扎（Tzinitza），其左侧为海洋所环绕，……秦尼扎国向左方偏斜相当严重，所以丝绸商队从陆上经过各国辗转到波斯，所需的时间比较短，而从海路到达波斯，其距离却大的多。……从海上去秦尼扎的人……需要穿越整个印度洋，其距离也非常的大。所以，经路陆从秦尼扎到波斯的人就会大大缩短其旅程。这可以解释波斯何以总是积储大量丝绸。”^②

这里有两点应注意：一是他较准确地记述了中国的方位；二是他明确指出了到达中国两条道路的特点。英国学者裕尔认为这里谈及的中国都是真实的，没有把它神秘化。

其次，在西方历史上罗马人第一次报道了中国历史的一个真实事件。这就是泰奥菲拉克特（Théophylacte）在他的《历史》一书中所提到的“桃花石人”。在我们考察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过程时，有一点不能忘记，在历史上中国和欧洲之间文化交流的桥梁是中亚地区和阿拉伯世界，西方关于中国的许多知识是经过中亚地区和阿拉伯文明这个中间环节的，泰奥菲拉克特关于“桃花石人”的报道就是根据突厥人的文献而来的。他在书中说在桃花石城（Taugaste）附近形成了一个非常勇敢而又强大的民族：桃花石人

① （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八，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2919 页。

② 科斯马斯：《世界基督风土志》。